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跨越式发展的路径

Ways and Means to Development of the Farm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in China

张文松 张明玉

(北方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44)

一、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是农业发展后的必然路径

我国二元结构的特点使得城镇居民成为农产品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在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人均收入提高引致的结果使整个消费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食品消费中具有较高收入弹性的高品质和卫生健康的农产品需求量不断增加,而收入弹性较低的满足温饱的基本农产品需求量相对减少。它意味着农业增长逐渐失去了常规农产品这一主导部门与品种的支持,需要调整农业增长结构以形成新的促进农业增长的主导产业部门。

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民已发生历史性变化。农产品供求关系已从以往的长期短缺转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农业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国农业目前已具备生产 5 亿吨粮

支持下,只要假以时日,我国肯定会具备这种能力。我国早就能够生产医疗用的 X 射线仪和核磁共振仪等大型仪器,应该说是具有相当的仪器研发能力的,因为这些医疗用仪器和研究中使用的仪器原理基本差别不大,如果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同时加强研究相应的自动分析系统软件,应该是可以研制出相应的高质量的分析仪器的。如当初白春礼院士从国外回国后没有用多长的时间就自主开发出了我国首台隧道扫描电镜,而且现在国内许多大学也有了这种分析仪器。可以说,我国现在已经有了开发大型软件的基础和能力,像东北大学的东大阿尔派公司在大型仪器和相应的软件开发方面已经表现出了很大的潜力,关键是国家的决策部门必须认识到分析仪器对我国科技创新研究的重要性,在政策上大力支持分析仪器产业的发展。前面已经提到过,国产分析仪器的主要问题是性能不稳定,如果有关企业能够继续努力,攻克仪器的系统稳定性,就完全可以让现有的分析仪器在试验室里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这些工作并不是一两年内就可以做到的,但是在国家的政策支持下,相信在不远的将

来肯定可以做到,届时我国现有的进口仪器大多也正进入报废期。这是一个不能再放弃的机会。

总之,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我国将要成为一个“世界制造工厂”,国家的前途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必须建立在科技创新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只有当我国真正成为“世界科学研究创新中心”的时候,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真正持续稳定地提高,我国才能真正实现科学研究的持续发展。要成为“世界科学研究创新中心”,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只有创造优越的研究环境和研究条件,才能培养出和留住优秀人才,才能形成人才辈出的局面。而根据前面所述,大型分析仪器正是当今时代科学研究创新的基础,这一条件我国不能完全依靠别的国家来提供,主要应靠我们国家自己。这个问题显然应该提上我国的议事日程了。如果国家能够利用各种研究基金和政策来支持我国大型分析仪器的研究开发,我国在不远的将来肯定能够拥有制造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型分析仪器产业,为我国成为“世界科学研究创新中心”打下必要的基础。

食、2 000 多万吨油料、4 亿吨蔬菜、5 000 万吨水果、5 000 多万吨肉类、3 500 万吨水产品的能力。尤其是已成为世界上粮食生产发展最快的国家,人均粮食由建国初期的 240 公斤提高到 1999 年的 404 公斤,比世界人均粮食 339 公斤高出 65 公斤。农产品生产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结构上看,不仅解决了 13 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也为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等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但由于我国粮食储藏、转化和深加工水平很低,出现了粮食高产与高效不同步的尖锐矛盾,严重制约了粮食生产的良性循环,影响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1993 年,全国人民直接消费的口粮为 2 750 亿公斤,2000 年口粮总量为 2 769 亿公斤,二者基本持平,我国粮食直接消费市场已基本饱和。而在全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对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膳食中制成食品的比重逐渐增大,崇尚健康已是一种追求和时尚,从原来吃得

(责任编辑 蔡德诚)

饱、吃得好,发展到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吃得科学,对食物的营养、口感、方便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绿色食品、保健食品、营养食品得到大发展,如新型、多功能、天然、多样、安全、复合、营养、保健、美观、便捷等。其发展趋势将逐渐由单一向复合、由单功能向多功能、由低档向中高档、由营养型向营养保健型、由一般食品向绿色食品和保健食品等方向发展。国外从60年代起,陆续发展起一类新的食品——功能食品(functional food),又称健康食品(healthy food),其产量和销售额增加非常迅速,就是这种趋势的反映。功能性食品在未来市场上有望走俏,许多公司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推出新型功能性系列食品,今后数年内,“含有尽可能多的促进健康的成分的食品将充斥市场”。美国正处在科学家所预言的食品工业革命的初始阶段,功能性食品(含有能促进健康或预防疾病的营养或植物成分的食品)工业迅猛发展。

现在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的食物中,工业化生产食品一般都已占70%,有的达到90%或95%,而我国居民食物中工业化生产的食品不到30%,并且大都是粮油等初加工食品,餐桌食品很少。预计到203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50%,一日三餐的工业化食品的比重将大幅度提高,从目前的16%增加到70%~80%,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专家预测,如果到2020年,农业产值与食品工业产值比达到1:1,我国食品工业产值就可能与农业产值一起突破3万亿元,成为全国第一大产业;如果两者之比达到1:2,食品工业产值将达到6万亿元,成为左右我国经济发展的超大型产业。

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着错综复杂的难题——农业比较收益偏低,许多地区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下降,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农村整个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但是劳动力转移缓慢、城镇化进程滞后,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且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少数人补贴多数人的政策在经济上缺乏支撑。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大幅度提高粮价来提高农民收入的路子很难行得通,靠传统的农业发展思路很难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只有创新农业生产方式,遵循国际农业发展规律,政府补贴农业,通过技术创新并加速技术变迁提高农业产出率,通过农产品加工提高农产品品质、降低成本,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打好基础,才能使农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这条路子才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可行选择。

当前我国的农业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相当程度停留在个体经营的传统农业的层次上,传统的耕作方式仍然存在,加工业不发达,工业化生产水平很低。而一些发达国家在农产品多层次上的开发利用已很有成效。比如我国东北的人参拿到日本或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经过深加工便成了高附加值产品,效益成倍增长。英国、美国、法国的农业之所以取得较高的效益,与其农业采用大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农产品加工业可使农产品技术含量大幅度提高成为高附加值的产品,贴近人民生活需求;使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变农业生产的比较劣势为比较优势;可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效益,使农业发展进入一种良性循环状态。这

对于改造传统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等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二、我国目前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现状

第一,农产品加工业的规模要求与土地分散经营存在矛盾。保持生产者与土地使用者的一致,是传统农业也是现代农业的基本原则和经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分散和均田的小规模土地经营方式,随着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的日益深入,其局限性也日益显露,比如,在资金、现代技术应用、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家庭经营的盲目性、家庭经营的短期行为等,严重制约了一体化经营层次、水平的提高。一体化经营要想发展,必须实现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和集约化,而集约化就是改变小规模生产方式,逐步实现与大市场要求相适应的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生产,也只有农业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农产品才可能有较高的商品率。二者兼具才可能使农业生产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农产品才有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

第二,农产品加工业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严重滞后于基础农业的发展。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大都在2.0~3.7:1以上,比如,美国为3.7:1,日本为2.2:1,而我国只有0.43:1。以食品工业为例,发达国家加工食品约占饮食消费的90%,而我国仅为25%左右;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产值约是农业产值的1.5~2倍,而我国还不及1/3。农业与食品工业的产值比为1:0.3;而在发达国家两者之比已达到1:5,低一点的也达到1:3或1:2,差距很大。每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约为5亿吨,而加工成工业食品的粮食仅有4000万吨,只占粮食总产量的8%。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程度在80%以上,而我国只有45%。以专用面粉为例,日本有60多种,英国有70多种,美国达100多种,我国仅为20种左右。以快餐业为例,麦当劳薯条供应商、全球最大多元化农业企业之一的辛普劳公司年销售额超过35亿美元,其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土豆种植及其深加工;肯德基公司1年在土豆泥1项上就可收入3亿多元。

第三,技术创新能力低,科技储备不足。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整体上,处于初加工多、水平低、规模小、综合利用差、耗能高的初级阶段,技术及装备水平低是最主要的原因。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的农产品加工技术与装备普遍落后10~20年,占90%左右的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低、设备落后,缺乏高质量和高水平的监测手段,有的甚至连质量标准都没有,更谈不上质量保证体系。我国农业科技80%以上的经费和研究力量投入在产中,对产后领域的科研工作一直忽视。农业科研是政府的职责,理应由政府来资助。尽管政府一再宣称应优先发展农业,但实际上农业科研投资(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水利、农村发展和副业)占国内农业总产值(GDP)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而且不稳定,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0.5%~0.6%)。根据国际经验,农业研究投资应占农业总产值的1%~2%,才能保证农业增长和工业

发展相协调。另外,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技成果在农产品加工上的转化率为30%,而发达国家一般为60%~80%。

第四,科技人员严重缺乏,企业素质有待提高。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在530多万名职工中只有8万多名大中专毕业的科技和管理人员,每万名职工中只有9名科技人员。发达国家从事农副产品深加工的劳动力是从事农业生产的5倍多,而我国还不到1/5。和国外农业生产部门从事农业人员相比,我国农民素质很低。如美国大部分农民是从州立农学院毕业的;法国7%以上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60%的青年农民具有中专水平;德国6.7%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53.2%的农民受过2~3.5年的职业培训;日本农民大学毕业的占5.9%,高中毕业的占74.8%,初中毕业的占19.4%。而我国农业劳动力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0.05%,高中毕业的占4.45%,初中毕业的占28.15%,文盲半文盲高达22.25%。由于经费困难和其它因素的驱动,我国农业科技人员和推广人员大量流失。长期性、基础性的研究投入严重不足,10~20年后有可能出现农业科技后备成果严重缺乏的局面。

第五,加工企业规模小,布局不合理。加工企业普遍存在生产规模小的问题,中小企业居多,缺乏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大型名牌企业或企业集团。企业分布也不合理,造成成本的增加和资源的难以有效利用。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20年来地区布局的格局没有发生太大变化。1997年,东、中、西三大区域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比为66:24:10,农产品加工业仍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农产品加工业的区域差距还表现在产品的深加工程度上。1997年,东部地区的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1.05:1,中部地区为0.58:1,西部地区为0.44:1。因此,农产品加工业必须跳出城市工业的框框,改变城乡工业的趋同化结构,形成具有比较优势和自身特色的产业(行业、产品)结构。

第六,适宜的加工品种缺乏。只有专门的品种和稳定的规模化、专业化的原料基地,才能保证加工品的质量。比如,要生产优质面条与面包,必须有面筋强度大、蛋白质含量高、可供磨制强力粉的小麦品种;要大力发展蔬菜、水果加工,就要选育适于制罐、腌制、脱水等各种用途的专用品种;要扩大肉类深精加工,就要更多地饲养瘦肉率达60%的瘦肉猪以及出肉率高的肉牛,等等。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只强调农产品产量,而忽视质量和加工专用品种的生产,以致粮食、水果等相当多的劣质产品积压与大量损耗,同时又不得不进口加工专用的优质原料。例如,我国面粉行业的骨干企业上海面粉有限公司1997年销售收入达11亿元以上,专用粉占其产品的30%~40%,但其原料大多依赖从国外进口。又比如,啤酒工业是我国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1998年啤酒产量达到1988万吨,仅次于美国;但啤酒业的主要原料啤酒大麦却长期进口,而且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三、我国农产品加工业面临的现实基础

一是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农户分散经营模式。1981年废除人民公社,成立乡镇政府基层组织,联产承包,包产到户,土地分散经营。全国各地农村基本上都实行了这种模式。据1994年的一项农业调查资源,在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9.8%的村采取了家庭承包经营形式,占全国农村总耕地面积的93.3%。这种分散承包的模式从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性来说,农业的生产要素投入(比如种子、化肥、农药)等都是有组织的活动,农产品的购买单位大部分也是有组织的活动,投入、生产、销售等价值链构成一个开放的系统,在系统中农产品的两头都是有组织的子系统。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分散生产的无序性必然损伤整体系统的有序性,降低系统效能。而且,这种模式极不利于科技投入、机械投入、人才投入,导致农作物产量、质量在低水平徘徊。因此,必须探讨在这种不同于国外家庭农场的产品生产方式下,我国如何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二是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实。社会主义的最根本宗旨就是全社会人民共同过上幸福的生活,消除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为此,我国实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更多的人一起富”的政策,执行了10多年,但结果不尽人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如何更快地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不解决,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生活质量问题,更严重的是会引发社会问题。

三是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是指农村经济在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这种不平衡发展导致农村经济现象在地区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即农村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人均农村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水平等差异显著且呈逐步扩大趋势。在农户每年的经营总收入中,粮食收入所占比重中西部约为41%、东部约为24%。

四是我国农民种粮不能致富的困境。在我国粮食生产成本持续上升的条件下,由于农民的经营规模非常小,数量又特别巨大,政府有无可能像日本那样对粮农进行高强度补贴?实际上,只要我国的粮食市场对外开放,相对稳定的国际价格(到岸价)将成为国内粮价的上限,国外具有优势的粮食和其它大宗农产品将在我国市场上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了保护和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多次提高了粮食收购价,但随之而来的是农业生产资料的轮番上涨,导致农民种粮的比较劣势愈发明显,大多数农民光靠种粮很难致富。全国务农农民的净增收收入额,若以1988年为100,则1989年为82.2,1990年为-248.0,1991年为-272.2,1993年为-464.1,1995年为-149.2。对上述问题的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必须寻找出路,而且不能按部就班、亦步亦趋、循规蹈矩,因为我们面临世界性的严峻挑战。

四、我国农产品加工业 跨越式发展路径选择

18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3次技术革命和引发的3次产业革命,都带来了科技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我国20世纪60年代初水稻的矮化育种和70年

代的杂交育种, 分别使水稻产量提高了 30% 和 20%; 80 年代推广地膜覆盖, 增产 20% 以上。这些都是单项技术的“跨越”。以育种技术和农业化学技术为主导的第一次农业技术革命, 曾使世界和中国粮食年均单产成 10 倍地增长。

量变与质变、渐进与跨越是发展的一般规律。技术革命本身就是质变和跨越, 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进步, 它对产业也将是跨越性的推动。这种客观的发展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 重要的是要发现和认识这个过程以及跨越的动因, 善于抓住机遇, 因势利导地实现跨越。

第一, 农产品加工业布局要向农区实行战略性转移。长期以来, 农产品加工业设在城市, 很不经济。应按照比较优势调整农产品加工业布局, 利用体制转轨和增长转型的机会, 采取经济政策诱导方法, 逐步调整农产品加工业布局, 将城市里的农产品加工业、饲料工业和食品工业, 积极稳妥有序地向农村区域转移, 新建类似企业也应设在农区市镇, 使其尽量接近原料集中产地。农区以制成品即最终产品供应城市, 比起为城市提供原料或初级产品要经济得多, 而且也可在农村转移劳动力创造更多机会。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要合理布局、适当集中, 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

第二, 由支持农民自由联合向发展合作经济组织转变。农业经营体制第一次改革形成的“统分结合, 双层经营”体制, 带有明显的社区性和封闭性, 而且许多地方集体层次缺乏实力, 作为基础层次的农户经营则更加分散化和非组织化。多数农业企业不仅规模小, 而且是各自为战, 没有形成如行业协会之类的同类企业联合组织。农民和行业的非组织化、协同性差, 很难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 不利于市场农业的发展。这就要求变革农业的组织结构, 创造与市场经济尤其是与国际竞争相适应的新型开放性产业组织结构。国际经验证明, 合作社是市场农业的重要经营形式, 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模式。在我国, 合作社有可能成长为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组织载体。只有广大农民参加合作社, 才会有真正发达的市场农业和全社会规模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没有条件建社的可以先行建立农民专业协会或农民专业合作协会, 农民组织不妨与农业企业、供销社联合建立专业合作社。这样, 组织化了的农民才有可能与其他市场力量进行公平竞争, 以文明合作社方式进行公平交易, 并学会运用合法手段维护自身利益。

第三, 由传统的农产品加工业向现代食品制造业转变。现在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的食物中, 工业化生产食品一般都已占 70%, 有的达到 90% 或 95%, 而我国居民食物中工业化生产的食品不到 30%, 并且大都是粮油等初加工食品, 餐桌食品很少。预计到 2030 年, 我国居民一日三餐的工业化食品的比重将大幅度提高, 从目前 16% 增加到 70%~80%, 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专家预测, 如果到 2020 年, 农业产值与食品工业产值比达到 1: 1, 我国食品工业产值就可能与农业产值一起突破 3 万亿元, 成为全国第一产业; 如果两者之比达到 1: 2, 食品工业产值将达到 6 万亿元, 成为左右我国经济发展的超大型产业。总的看来, 凡是农

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其产后部门特别是食品工业一般均达较高水平, 法国食品工业的 1986 年营业额高达 3 200 亿法郎, 在工业部门中居首位。我国台湾把食品工业作为“策略性工业之一”, 加以优先发展, 1980~1992 年, 食品工业产值年均增长 10.3%, 高于同期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9.1% 的速度, 食品工业与农业产值之比达到 2.63: 1 的国际先进水平; 通过食品工业产品的大量出口, 不仅换取了大量外汇, 为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还加快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显著提高了农业比较效益, 促成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第四, 由传统的分散经营向现代产加销一体化经营转变。产加销一体化, 可以优化生产要素组合, 充分发挥科技要素的作用, 从而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档次, 实现多层次增值, 使农民收入获得大幅度提高; 可以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激励农民走上新的联合之路, 逐步形成与支柱产业需求相配套、与专业化和区域化生产相适应的区域经济格局, 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和扩大市场占有率; 可以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农业和商业的有机结合, 形成多产业环环相扣、相互依存的一体化产业链, 从而推进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第五, 由传统农产品加工技术向高新技术转变。我国人均耕地少、水资源少、人口众多, 传统的以资源为基础的简单技术加工已不能适应未来人口的发展, “今后农业增长只能主要靠技术进步, 此后二三十年内农业总产量的增长主要靠改进了的常规技术, 21 世纪 20 年代以后, 常规技术将不能支持亚洲国家对农产品的需求, 而将转向更多地应用新技术 (V. W. Ruttan, 1989)”。这要求农业要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广泛开展国际科技交流, 引进高新技术, 改造传统技术。重点领域主要集中在: 适应工业化生产的专用原料加工技术 (如加工专用粮食、果蔬、畜禽品种选育技术及种养殖技术体系等), 原料产地加工技术 (如主要农产品产地储藏保鲜技术、气流对撞干燥技术、冷杀菌技术等), 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 (如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质构重组技术、超高压技术、超微粉碎技术、大豆卵磷脂提取技术、淀粉修饰技术等), 农副产品综合利用技术 (如单细胞蛋白生产技术、果蔬综合利用技术、无公害农业技术等)。

第六, 农产品加工业产品由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转变到国内、国外并重。我国的农产品加工业要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积极参与国际经贸大循环, 争得尽可能多的比较利益。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市场已逐步融入世界市场之中, 加入 WTO 后更是如此。要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面向国际市场发展生产, 不断提高农产品加工的技术、工艺和管理水平, 鼓励国内农产品加工品出口, 促进出口创汇和外向型农业的发展, 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调剂产品品种余缺和平抑国内市场, 并从国际市场获得产品信息和先进技术。

第七, 产品加工单位由分散的独立型的小企业 (小作坊) 向集团型的大企业转变。针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战略, 邓小平同志早在 1990 年就敏锐地指出: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 从长远的观点看, 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 是废除人民公社,

知识管理与大学核心竞争力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University's Core Competence

林 莉 刘元芳

(大连理工大学 21 世纪发展研究中心 大连 116023)

近年来,国内管理界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核心理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研究文献层出不穷。“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一词最早来源于哈默(Gary Hamel)和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一文,他们认为“公司是一棵大树,树干和大树枝是核心产品,小树枝是业务单位,叶、花、果实是最终产品,提供养分、营养和保持稳定的根系是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是一个企业所具有的在本行业独树一帜的,可提供进入广阔市场的潜力,从而成为企业竞争优势之源的内源性动力。伴随着高等教育产业化理论的深入探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国际化,大学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大学已步入“战国时代”。如何提升核心竞争力的议题不仅限于企业,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产业,也亟待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根基在于知识,而知识管理的实施正是为了增强组织绩效而创造、获取和使用知识的过程,引入知识管理是提升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战略。

一、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内涵、特征及本质

1. 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内涵

要论及大学核心竞争力首先要了解大学竞争力。大学竞争力是大学为了实现其总体目标,获取、配置可利用的资源,采取各种有效策略,成功地实现大学功能的各种能力体系;大学核心竞争力则是大学内部一系列互补的知识和技能的组合,它具有使大学达到国内甚至世界一流水平的能力。大学核心竞争力是大学竞争力诸要素协同、整合作用的结果,它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以大学基础设施为依托、以大学精神为共同远景,办学理

念、组织管理、学术梯队、校园文化以及校园的外部资源等竞争力诸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动态型的特征。图 1 所示为大学竞争力要素与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2 大学核心竞争力的特征

(1) 异质性 核心竞争力是与竞争对手相比的独特的差异化特征,以隐性知识为主,它是难以模仿的。包括某一学科突出的教学能力、科研能力、社会服务能力,尤其是这 3 项功能相协调的能力。如,清华大学以计算机、材料学科闻名,大连工学院则以计算机学等而著称。

(2) 衍生性 核心竞争力是整个组织竞争力诸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不是某个员工或部门的独有资源,具有强大的辐射作用,大学在某一方面拥有核心能力,就可以在相关领域衍生出新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使核心竞争力不断升级转换,获得持续核心竞争力。

(3) 历史积淀性 一个组织的发展历史造成它具有“特殊的缺陷和能力”,大学也不例外,任何一所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核心竞争力是涉及时间依赖的路径依赖过程,具有阶段性和层次性,它反映了大学独特的历史路径。这些知识和能力反映了存在于某一大学中的独特经验,并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但同时也说明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是具有时间价值的或有生命周期的。

(4) 用户价值性 美国学者 Debra M Amidon (1997) 认为用户不仅是销售的对象,而且是学习和知识的真正源泉。大学作为特殊的知识产业,以学生为用户。大学核心竞争力一方面表现为大学自身的价值,如大学品牌、学术声誉的形成;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给学生带来更多的“消费者剩余”,增加学生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现阶段,因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以及所牵涉到的总人口 80% 的农民的生存等

重大问题,我们还不能实现农业的第二个飞跃。但是,我们可以在小范围内,比如农产品加工业内实现飞跃,即由分散的独立型的小企业(小作坊)向集团型的大企业转变。

(删去 60 余篇参考与注释文献、资料的目录)

(责任编辑 王宏章)